

# 目 录

摘 要.....	II
Abstract.....	III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3
一、太行山东麓地区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3
二、区域内商文化和殷遗民研究.....	5
(一) 商文化研究.....	5
(二) 殷遗民研究.....	8
(三) 区域内周文化研究.....	8
(四) 区域内其他考古学文化研究.....	11
(五) 商周之际相关研究.....	13
三、相关问题说明.....	14
第一章 太行山东麓地区考古发现综览.....	16
第一节 南区考古新发现概述.....	17
一、南区殷墟三、四期相关遗存.....	18
(一) 石家庄市相关遗址.....	18
(二) 邢台市相关遗址.....	20
(三) 邯郸市相关遗址.....	23
(四) 唐河以南的保定市、沧州市相关遗址.....	26
(五) 河南地区的晚商考古新发现.....	28
二、南区西周早期发现.....	29
第二节 北区考古新发现概述.....	32
一、商代晚期北区考古新发现.....	32
二、冀东、天津地区.....	34
三、西周早期北区考古新发现.....	35
第三节 小结.....	36
第二章 太行山东麓地区殷墟三、四期遗存相关研究.....	38

第一节 太行山东麓地区殷墟三、四期文化格局 .....	38
一、殷墟三期商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 .....	38
二、殷墟四期商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 .....	41
第二节 太行山东麓地区殷墟三、四期聚落形态研究 .....	42
一、商文化的聚落形态 .....	42
二、围坊三期文化的聚落形态 .....	43
三、商文化对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治理模式 .....	43
第三节 小结 .....	44
第三章 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早期相关研究 .....	45
第一节 新发现所见西周卫国、邢国、燕国殷遗民治理模式 .....	46
一、卫国的殷遗民治理模式 .....	46
二、邢国的殷遗民治理模式 .....	46
二、燕国的殷遗民治理模式 .....	47
第二节 西周卫国、邢国、燕国姬周文化中的特异因素 .....	48
一、卫国姬周文化中的特异因素 .....	48
二、邢国姬周文化中的特异因素 .....	48
三、燕国姬周文化中的特异因素 .....	49
第三节 小结 .....	49
结 语 .....	50
参考文献 .....	51
后 记 .....	58

## 插图目录

图 1-1	太行山东麓地区位置示意图(阴影区域).....	1
图 2-1	太行山东麓地区唐河位置示意图.....	17
图 2-2	周家庄遗址 M5 墓地.....	18
图 2-3	临城补要遗址出土中、晚商时期遗物.....	21
图 2-4	后白寺遗址出土三期陶鬲.....	26
图 2-5	南小汪遗址出土西周刻辞卜骨摹本.....	31
图 2-6	张家洼遗址商周墓葬分布图.....	33
图 2-7	近年来太行山东麓商周时期遗址分布图.....	36

## 表格目录

表 2-1	石家庄地区晚商遗存新发现年代表.....	19
表 2-2	邢台地区晚商遗存新发现年代表.....	23
表 2-3	邯郸地区晚商遗存新发现年代表.....	25
表 2-4	唐河以南的保定市、沧州市相关遗址年代分期表.....	28
表 2-5	近年来太行山东麓商周时期遗址分布数量（地级市划分）.....	37

## 绪论

太行山东麓地区是指今行政区划的河北中部、南部、北京、天津及河南北部地区。区域内所辖地级市主要包括张家口、保定、唐山、石家庄、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和安阳等。本区域的地貌类型为山前冲积扇和冲积平原，海拔普遍较低，气候温暖干燥，降水量适中，适宜人类生存，至今仍是我国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据《中国文物地图集 河北分册》等资料显示，河北地区共分布 46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商文化遗址 370 多处、西周遗址 60 多处<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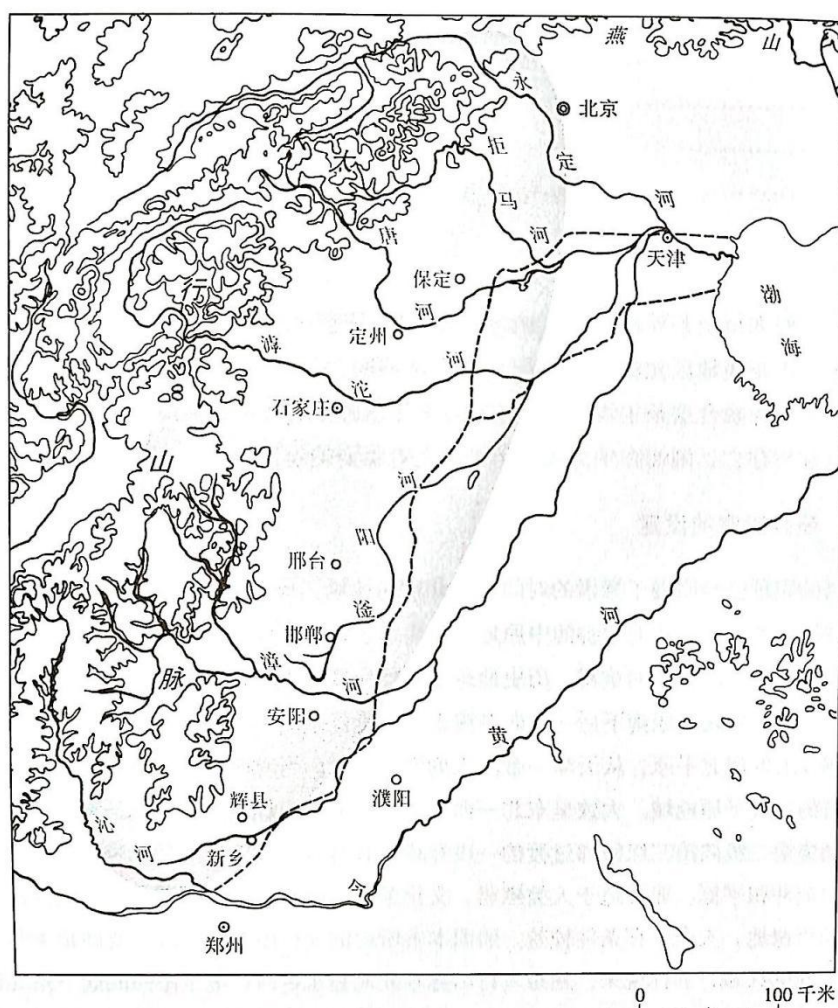


图 1-1 太行山东麓地区位置示意图（阴影区域）

<sup>[1]</sup>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 河北分册 上》，2013 年，第 5-7 页。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因太行山东麓地区地处北方文化区、海岱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的交界地带，故早已受到学界瞩目。1982年苏秉琦先生在河北省蔚县三关考古工地的考古座谈会上提出著名的“三岔口”理论（即辽西、中原与河套三个地区的古文化在蔚县交汇、融合），认为张家口地区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sup>[1]</sup>。其后1985年苏秉琦先生又在山西侯马晋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Y型文化带理论，进一步将太行山西麓的晋南地区也纳入更广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地带<sup>[2]</sup>。郭大顺先生虽立足内蒙古中西部归纳苏秉琦先生的精彩论断，但也认可燕山南北、太行山东麓地区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sup>[3]</sup>。张渭莲、段宏振先生更创造性地提出太行山东麓地区为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sup>[4]</sup>。

正因具备良好的地理条件，自中商时期以来，太行山东麓地区便已取代河洛地区成为商王室的政治中心，安阳一带成为武丁以后的商都所在。晚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与中原商文化在拒马河到滹沱河之间的广大地域一带进行拉锯、争夺<sup>[5]</sup>。单就商文化而言，殷墟二期时其北界最远至定州一带，殷墟四期向北扩张至容城、任丘一带<sup>[6]</sup>。武王伐商和周公东征以后，太行山东麓地区作为殷商故地和与北方青铜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自然是周文化必须悉心经营的重要地区。故周王室选择“封建亲戚，以蕃屏周”<sup>[7]</sup>，邢、燕、卫等姬姓诸侯国皆分封于此。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太行山东麓地区不断涌现出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易县七里庄遗址等。特别是近年来重大发现频出：栾城周家庄墓地发现带墓道大墓；灵寿西木佛墓地既有带墓道甲字形大墓，同时还发现河北首座车马坑。西周时期的发现同样瞩目，北京琉璃河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墓地的考古工作已再次重启，涑水张家洼遗址发现商周更替时期遗存。新的资料为我们探索商周时期太行山东麓的文化面貌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质上来说，太行山东麓地区一直是多个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在这样的地区，进行长时段研究是较为适宜的。然而选取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也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历

<sup>[1]</sup> 苏秉琦：《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见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sup>[2]</sup> 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21页。

<sup>[3]</sup> 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sup>[4]</sup> 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2015年，第309-336页。

<sup>[5]</sup> 段宏振：《太行山脉东西两翼：中原与北方青铜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sup>[6]</sup> 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

<sup>[7]</sup>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史事件对特定区域的影响。晚商时期，特别是在殷墟三、四期时商文化与北方青铜文化进退，是一个较为引人入胜的课题。进入西周以后，周人对殷遗民的治理、与北方青铜文化的接触等问题都亟待解决。故本文选择以殷墟三期、殷墟四期及西周早期的太行山东麓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对象，以聚落考古、文化因素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考察。通过整理、归纳，探索商周之际太行山东麓地区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重要作用。

##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至迟于民国时期，学界就已经意识到太行山东麓地区在商周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丁山先生是较早将商族起源追溯至河北境内的学者，其观点为商人的发源地应在漳河流域，此后迁徙发展终至中原，属于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sup>[1]</sup>。丁氏的族属判定虽有可商之处，但是商族起源地区的判定与邹衡先生的观点较为接近<sup>[2]</sup>，更与今日的考古发现相合。王国维先生的《北伯鼎跋》<sup>[3]</sup>则是较早的有关河北地区西周时期的成果。王先生依据北伯鼎的出土地河北涑水县张家洼推断邶、鄘皆应在殷之故地，指出“邶”实际为燕。王氏对于燕国的推断虽不甚精准，但近年来涑水张家洼确有重要的商周之际考古发现<sup>[4]</sup>。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硕果累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研究亦不例外，下面将以研究所涉的主题为线索回顾研究史。

### 一、太行山东麓地区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最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莫过于《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文化演进与互动：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和《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文化谱系》。

张渭莲、段宏振先生的《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sup>[5]</sup>于2015年出版，是一本较为系统梳理与研究太行山东麓考古发现的专著。该专著的时间上限早至旧石器时代，时间下限晚至东周时期。文中以易水为界，将商代的太行山东麓地区划分为南北两区，两区的遗存都可自二里岗下层早段延续至殷墟四期晚段，没有大的缺环。西周时期的遗存也可分为两区，只是分界线变动至唐河附近，遗存同样有较强的延续

<sup>[1]</sup> 丁山：《盘庚迁殷以前商族踪迹之追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5-33页。

<sup>[2]</sup>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sup>[3]</sup> 王国维：《北伯鼎跋》，见王国维、黄爱梅校注：《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66页。

<sup>[4]</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涑水县文物局：《河北涑水张家洼遗址2021年度商周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3年（第3期）。

<sup>[5]</sup> 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 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文物出版社，2015年。

性，皆可自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晚商、西周时期的南区文化面貌基本表现的都是中原的商、周文化，北区的文化面貌大致是以北方青铜文化（分别是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的。该书最重要的成果便是系统归纳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时期文化演进格局，并给出分期、分区意见，并分析形成文化格局的原因。将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文化格局归纳为具有地域走廊色彩的走廊文化，表现为文化区系的不稳定性、文化谱系发展的不连贯性和文化内涵的中介性。该书的研究方法较为新颖，主要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形态等方法，结合自然科学特别是气候、地形地貌等研究成果得出结论。

文中所提出的以下观点值得重视：①冷暖交替所致的环境变迁会使得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的边界不断变化，暖期中原文化北上，冷期北方文化南下；②夏商西周时期中原文化基本控制太行山东麓地区，与北方文化形成南北向对峙，两者的边界不断迁移，文化互动方向以南北向为主；③区域内的文明发生方式有三种，政治中心迁移式、军事对抗式和武装殖民式。④太行山东麓地区是中国历史文化走廊，且这一历史现象自史前时期就已形成。

蒋刚先生的《文化演进与互动：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sup>[1]</sup>于2017年出版。因该专著以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考古发现为研究对象，故将太行山东麓地区划分为东区进行研究。在东区的分期方面，将晚商、西周时期合并讨论。在分区、分期的基础上进行遗址的文化因素分析，考察夏商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变迁和演进，并探讨中原文化经略北方（太行山东麓）、西方（太行山西麓）的异同。在文化演进模式上东、西差异明显，相比于西区的断裂性文化演进模式，东区是连续性的演进模式。文中指出夏商文化对太行山东麓地区的经略是“分封联盟”，西周时期周文化的治理模式转变为“分封隶属”。总体而言，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的宏观认知方面，蒋刚先生与张渭莲、段宏振先生存在差异。两者的具体差异表现在个别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归属和考古学文化分期方面，以围坊三期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年代为例，两者差距较大。蒋刚先生认为应以永定河为界划分两种文化，在永定河以东地区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张家园型替代围坊三期文化围坊型，在永定河以西地区是张家园上层文化镇江营型为继承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而来。而张渭莲、段宏振先生则认为两者是前后相继的两种考古学文化。正如常怀颖先生在其专著学术史回顾中所指出的观察视角大小的区别、分析细致程度的差距便是造成两文资料相近，却对太行山东麓文化格局演进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根本性原因<sup>[2]</sup>。

常怀颖先生的《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文化谱系》<sup>[3]</sup>于2022年出版，资料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该专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以陶器及陶器

<sup>[1]</sup> 蒋刚：《文化演进与互动 太行山两翼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

<sup>[2]</sup> 常怀颖：《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 文化谱系篇 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第63页。

<sup>[3]</sup> 常怀颖：《夏商时期古冀州的考古学研究 文化谱系篇 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群区分人群，将考古学文化与人群（文献中的族群）对应，考察古冀州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演变。文中将古冀州划分为四个大区域，冀州东南部、东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再进一步八个小区域，分别是豫北、冀南与冀中南、冀中北部、华北平原北缘、冀西北、晋南、晋中和忻定盆地及晋西北与南流黄河两岸地区，其中前五个区域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区。该文同时还考察周边考古学文化对古冀州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在夏时期各小区域的文化面貌相对独立，至早商时期逐渐整合、重塑，而晚商时期有分裂的趋势。针对晚商时期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文化面貌，常怀颖先生认为冀州的中部、南部尚能为商文化直接控制，但冀北特别是易水以北已为围坊三期文化所控制。此时冀州的文化一体性格局遭到破坏，商王朝的北境已较早商时期南移。商王室对外输出的铜器、陶器、玉石器、礼制等文化因素对周边地区影响较大，但周边文化却无法施加同样的影响力。相比于蒋刚先生和张渭莲、段宏振先生，常怀颖先生更看重太行山两麓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太行八陉便是太行山东、西两翼文化交流的通道。

尽管三本专著在分期方案、北方青铜文化命名等问题方面尚存在分歧，但在晚商时期对于商文化的北界、北方青铜文化与商文化互动、商文化对太行山东麓地区的统治模式等方面已达成共识。

需要补充的是，2019年河北考古70年回眸系列论文中洪猛先生所作的夏商周考古总结中提出：河北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系统、三大序列、复杂演进”<sup>[1]</sup>。其南北分区的界限在拒马河流域，同时文中的三大序列与上述三本专著略有不同。将燕山以北地区单独划分出冀北山地区，并将其文化序列概括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小白阳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复杂演进背后暗藏的是文化类型多、文化结构多元复杂、文化小区多样、文化交错分布、人群分支多，相对而言还是强调更具不稳定性。

## 二、区域内商文化和殷遗民研究

### （一）商文化研究

#### 1. 晚商时期商文化的北界探索

早商时期二里岗文化的扩张态势明显，其北境可至张家口一带<sup>[2]</sup>。进入晚商以后，殷墟文化的扩展相对受限，学界对于晚商时期商文化北界的探索也有较多成果。

自定州北庄子墓地<sup>[3]</sup>发现以来，晚商时期商文化对北方的经略状况逐渐明晰。学界大多

<sup>[1]</sup> 洪猛：《河北省考古七十年回顾与展望：夏商周考古》，《文物春秋》2019年（第6期）。

<sup>[2]</sup> 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sup>[3]</sup>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认可北庄子墓地的葬俗、礼器组合等与殷墟同等级墓葬较为接近，是商文化的高等级墓葬<sup>[1]</sup>。因此商文化的北界划分，也常以该墓地为界。

刘绪先生曾分析商文化的四至，认为晚商时期商文化的控制力可达唐河南岸地带<sup>[2]</sup>。常怀颖先生赞同刘绪先生观点<sup>[3]</sup>。张翠莲、段宏振先生此前进行分区时商时期选择将易水作为边界，当是考虑早商、晚商的平衡问题<sup>[4]</sup>。此后张翠莲先生单独论及晚商时期商文化的北界时，提出商的北界虽略有摆动，但大致在唐河一带。唐河以南为商文化所控制，唐河以北为围坊三期文化所控制<sup>[5]</sup>。唐河、易水流域的位置大致都位于今河北保定市的中、西部，较定州更偏北。

蒋刚先生认为以定州为中心的冀中一带是殷墟文化的直接分布区域，<sup>[6]</sup>商文化的北界大致在保定以南<sup>[7]</sup>，实际是接近易水的。

韦心滢先生认为商王室的政治地理结构包括王畿、近畿、边域及边域外邻近方国四个层级。其文将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冀南地区（磁县、武安、邢台）划分为近畿地区<sup>[8]</sup>，石家庄一带划分为北部边域地区前沿<sup>[9]</sup>。这也是目前所见最靠南的商的北界划分方案。

## 2. 太行山东麓地区晚商时期商文化墓葬及相关研究

综合性商文化墓葬研究成果大多讨论晚商时期区域内的重要发现—定州北庄子墓地的相关情况。如郜向平先生注意到北庄子墓地中的有些墓葬存在爵、觚不等量配置现象，与殷墟商文化的礼制不同<sup>[10]</sup>。北庄子墓地墓葬的棺椁设置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有壁龛墓、无棺有椁墓、椁底设垫木等多种形式。

常怀颖先生不仅关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随葬陶器的族墓地，而且关注铜器墓的情况，有系列论文与此相关。族墓地、与殷墟互动情况可归纳<sup>[11]</sup>为以下点：①武安赵窑、磁县下七垣和定州北庄子三处墓地中随葬陶器的墓葬数量均较少，仅一座墓葬随葬成组的陶觚、爵，赵窑墓地有鬲、无簋，下七垣墓地有鬲有簋，北庄子墓地陶簋居多；②围坊三期文化中的高领

<sup>[1]</sup>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2页。

<sup>[2]</sup> 刘绪：《商文化的纵横考察》，见刘绪：《夏商周文化与田野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09-140页。

<sup>[3]</sup> 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sup>[4]</sup> 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 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sup>[5]</sup> 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

<sup>[6]</sup> 蒋刚：《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及其与夏商西周文化的互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4页。

<sup>[7]</sup> 蒋刚：《冀西北、京津唐地区夏商西周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

<sup>[8]</sup> 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6-259页。

<sup>[9]</sup> 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49，353页，文中提及无极、正定、新乐至定州一带。定州归属河北省保定市，临近石家庄北部的新乐，较易县及易水更南。

<sup>[10]</sup>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sup>[11]</sup> 常怀颖：《殷墟出土晚商陶器所见晋陕冀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因素》，《文物》2021年（第7期）；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76002210012011005>